

翻译方法论

黄忠廉 等著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H059

106

翻译方法论

黄忠廉 等著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方法论 / 黄忠廉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04 - 8147 - 8

I. 翻… II. 黄… III. 翻译学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841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高 涵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再谈方法论

——《翻译方法论》序

1999年10月我应张后尘先生之邀在大连外语学院举办的“中国外语博士论坛”第一次专门讲了方法论问题，之后又在南开大学等几个高校讲过，那份讲稿就是发表在2002年第2期《外语与外语教学》上的《小谈方法论》。这两年又应邀到一些学校、学术会议、研究生导师培训班等场合去讲创新思维和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方法，但讲稿尚未发表。

为什么要讲方法和方法论呢？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我们在做英汉语言对比研究和中西文化、哲学、逻辑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深深感觉到，跟西方相比我们有严重轻视理论与方法的文化、教育与学术传统。原因是我们的传统哲学强调天道与人道合一，本体与现象不可二分；强调对事物要综合整体把握，不能层层分析；强调认识主要靠主观感悟与比类，缺少演绎逻辑推理的系统。我们的文化以政治伦理为核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极力强调以“经世之用”为灵魂的“学以致用”。我们先秦时代的墨家逻辑已有较丰富的逻辑思想，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抽象度与系统性，可以说已有了形式逻辑的初步形态，比如有类似概念的类别：名——达名、类名、私名。有类似判断的类别：辞——效、假、或；“莫不”表全称，“特”或“有”表特称。也有类似推理的类别：说——辟、侔、援、推。此外还有的说“以类取”就是归纳推理，“以类予”就是演绎推理；“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就是说的同一律，“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必或不当”就是说的矛盾律，“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谓辩无胜，必不当”就是说的排中律等。但是由于墨家研究逻辑的目的是“取当求胜”，而不是“求真求则”，是“审治乱之纪”，而不是“求知寻法”，所以它始终都注重内容的论证，以利推行其“兼相爱，天下治”的政治主张，而不关心思维的结构形式（如概念、判断、推理等），也无须借鉴公理化方法，因此也就没有发展成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形式逻辑。正如崔清田先生所说：

它（中国逻辑）没有引入变项和区分出相对于变项的常项，自然也就没有明晰规范的命题表达式以及推理的论式。就推类而言，虽然中国逻辑对之作了一般性和概括性的研究，但这一研究不是着力于逻辑结构的分析，而是侧重在描写性的说明，以及实质内容的考虑。这种重内容轻形式的特征，在对不同推类方式的说明和推类正误的判定上，均有表现。^①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墨家逻辑就从此中断了，失去了发展的历史机遇。从那时到1905年，严复译《穆勒名学》（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我们的民族就几乎断绝了形式逻辑的研究（其间虽有印度因明传入，但仅限于佛门，影响甚微）。墨家逻辑的命运致使我们整个民族在这漫长的两千多年间失去了形式逻辑这种追求形式化的理性思维方式的洗礼，也因此固化了“观物—取象—比类—体道”的思维方式，催促了“重使用，轻理论”的文化传统、教育传统与学术传统的形成。周立升先生对此有很深刻的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易》所概括的“观物—取象—比类—体道”的方法，它不仅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一直影响着后人的思维程式。这种取象以体道的思维方式，显然不可能运用逻辑推理和名言论证的方法来把握，而必须把对象作为活动着的整体，并把它置于相互关联的生化系统中，运用具象与抽象、直觉与思辨互渗的方法才能把握。然而必须看到，直觉思维只有同逻辑思维相结合，并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充分发挥直觉思维的作用。中国古代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以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使它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神秘性，这是应当予以克服的。^②

现在来看轻视理论与方法的传统还在严重地影响着我国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创新，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评论，以引起更多人的思考与关注。

第二是因为我们正在步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特点可说很多，但我们感受最深、最直接的有：（1）信息爆炸。正面说是知识更新加快，据说1999—2002年全世界信息生产量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增长。负面说就是

① 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② 高晨阳：《传统思维方式研究》序，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其中垃圾信息暴增，而且常以最新科学技术或艺术成果的面貌出现，真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造成信息超载、泛滥、浪费，甚至让人患上“信息污染综合征”。让你感到犹如坠入信息的汪洋大海，而又找不到救命的船只，结果就会毁于垃圾信息之中。这样的形势与局面最需要人的识别与选择优劣信息的见识与能力。(2) 信息时代，信息的价值增高，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只能是创新的信息，所以创新成了信息时代的核心问题。创新需要许多条件，但最关键的条件是多学科的（而不是单一学科的）先进的（而不是落后的）理论与方法。而我们中国却恰恰是个“理论与方法的消费大国”，因为“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体知，重经验不重理论，对许多事物的道理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①。另外我们还养成了一种把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的毛病：“理论联系实际是谁也不否认的。但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时，有时往往用功利主义观点对基础理论一概加以抹杀，全部斥之为脱离实际。这是多年来轻视基础理论的后果。”^② 再看张岱年先生一生研究中西哲学与文化最后作出的总结性批判：“由于重视整体思维，因而缺乏对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崇直觉，因而特别忽视缜密论证的重要。中国传统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的完整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到了近古时代，也没有出现西方十六、十七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没有伽利略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重大缺陷。”^③ 王张两先生讲的“重大缺陷”不是指的某些行业人的缺陷，也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的人的缺陷，而是指的从古代至近代甚至至今我们全民族的缺陷。如果我们至今还不能真正明白和看清这些重大缺陷，从而采取有效的方针、政策与措施来加以改变，恐怕很难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以致又一次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信息爆炸需要人的识别与选择能力，识别与选择能力来自人的理论与方法的学养；知识创新其主要形式是理论与方法的更替。所以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性已经发展到历史上从来未有的高度，方法论“已成为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改革、成功、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④。用这个观点来检查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博士整个教育系统最轻视的就是这个内容，最看重与训练最多的是考试的技巧、速成的技巧甚至是作弊的技巧。面对这样的传统和现实，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大声呼吁重视理论与方法吗？！

① 王元化：《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② 王元化：《谈文短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③ 《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④ 李志才：《方法论全书》（I），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黄忠廉教授很重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专门组织人写了一本《翻译方法论》，这本书可能是翻译学领域专门探讨翻译方法和翻译研究方法的第一部著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拓性的研究，值得推荐给大家阅读。我先睹为快，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构建了一个翻译方法论系统。他称这个系统叫“翻译方法论”，定义为“是翻译及其研究方式方法的总和”。它之下分两部分：翻译实践方法论与翻译研究方法论。而翻译实践方法论又划分为全译方法论（直译 + 意译）和变译方法论（变通 + 全译）。翻译研究方法论之下包含“‘三个充分’的研究要求、‘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和从方法到学科的研究阶梯”。这个系统明确区分了翻译实践的方法与翻译研究的方法，把翻译实践的方法又区分为全译和变译，这种比较区分的方法既有利于对不同的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又有利于指导不同领域的实践。周有光先生说：“比较引起分类，分类形成系统，比较、分类、系统化是知识进入科学领域的重要门径。”^①

第二，很重视概念的界定、分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全书研究了许多概念，比如有上层的方法、方法论、求似率、全译、转换、变译、摄取、翻译研究等；有下层的全译 7 种方法、变译 12 种方法等，此外还有中层的一些概念。我们且不管这些概念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是否都很科学，单就这些概念的界定、分类、相互关系的研究方法就很值得充分肯定。因为在翻译学领域这是开拓性的工作，过去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大家都不会忘记关于信达雅的论争、直译和意译以及归化与异化的讨论，基本都是靠整体感悟与类比的方法，既不界定，不分化，也不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无建立分级的范畴系统的意识。因此虽然时间与精力耗费得难以计算，但对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却没作出多大贡献。正如沈苏儒先生所说：“几十年来对‘信达雅’说的讨论，‘从总体上看，似乎始终处于盘旋的状态’，并无实质性的突破。”^②《翻译方法论》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信号，我国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建设将要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读了这本书稿还使我联想到许多问题，现在选几个跟翻译学方法论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思考与研究。

首先是翻译学方法论系统及其密切相关的范畴、概念、术语问题。（1）翻译学方法论系统。目前国内外虽然尚未建立起翻译学的方法论系统，但这个系统的隶属关系我们应力争早一天讨论清楚，这样有利于方法论系统

①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前言，语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② 沈苏儒：《论信达雅》，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112 页。

和整个学科系统的研究与建设。名称叫“翻译学方法论系统”更科学一些,因为它在上位概念“翻译学学科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下位概念来说,它理所当然地包括这个学科方法论的各个层面,当然包括“翻译实践的方法论”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而且还应包括“翻译教学的方法论”和“翻译批评的方法论”,这四个不同层面都属于它的子系统。从方法论系统来看,这四个子系统都还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我在此呼吁译界学人学子都来关注、研究、建设这个领域。

(2) 理论、方法、方法论三者的关系。方法是指认识、表达与实践的具体做法,内容包括思路、途径、方式、程序。方法论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比方法抽象程度高,属于理论层面,内容包括元方法论、哲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落实在翻译学领域,元方法论应该研究上述翻译学方法论系统及其和哲学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关系;哲学方法论应研究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应用其原理与定律研究翻译学方法论系统。这些工作我们都还没有去做,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在《小谈方法论》中论述过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今天我想强调两点:一是方法有相对独立性,不都是理论派生的,也不都是依附于理论的。当理论还未成熟或理论危机的时候,可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或用新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而创建新的方法来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二是理论的最本质的意义是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凡理论都有方法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来说理论和方法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说理论常带上方法,说方法也常加上理论。

(3) 策略、方法、技巧三者的关系。汉语中跟“策略”关系密切的有“战略”与“战术”,“战略”强调全局的计划与策略,“战术”着重于局部作战的原则与方法,“策略”强调行动的方针与做事的方式方法。三者是有区别的,“策略”介于“战略”和“战术”之间。英语的 Strategy 常译成“战略”或“策略”, tactics 常译成“战术”或“策略”,可见“策略”在英语中有两个可对应的词,但强调“谋划、对策、手段”之意时,英语的两个词均可用。“方法”强调程序、过程、模式、规则;“技巧”强调操作层面的技术、技能、技艺。英语的 method 常译成“方法”, technique 和 skill 常译成“技巧”,但英语的 technique 强调具体技术的运用程序,更靠向 method,而 skill 强调专门的技能、技艺,更靠近实践。这样我们就可在翻译实践方法论这个层面区分出翻译策略(归化、异化;全译、变译),翻译方法(音译、直译、意译),翻译技巧(包括音韵、词汇、短语、句子、句组、语篇、文体、修辞等语言各层面的翻译技巧,当然也包括本书所列的7种全译的方法与12种变译的方法,还包括口译和机译的技巧)。汉语口语中

“方法”与“技巧”经常同义混用，所以本书所说的全译和变译的“方法”实际就是我们说的“技巧”，因为它们都是离实践最近的操作层面的具体做法，比方法抽象程度低。策略、方法、技巧三者的关系从左到右越来越靠近实践，抽象程度越来越低，可操作性越来越强；反方向从右到左离实践越来越远，抽象程度越来越高，可操作性越来越弱。

其次是翻译的本质属性问题。多年的翻译教学和研究使我逐渐明白了：翻译（包括口译、笔译与机译）是有文本参照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人类的社会交际行为与活动，其结果因译者意愿与社会需求的不同而产生出无数种跟原文距离远近不等的译文变体（translation varieties），其变体在原文和译语作品之间构成了一个集合（set）。如下图所示：



图中从 T_1 （= Translation 1）到 T_n （= Translation n）都是译文，中间包括无数种译文。 T_1 是最靠近原文的译文，也就是最忠实原文的译文； T_n 是离原文最远的译文，也就是最不忠实原文的译文。从 T_1 向右运动译文越来越不忠实原文，从 T_n 向左运动译文越来越忠实原文。这个图比较科学地描述了翻译的实际状况，对各种不同形式的翻译有较强的解释力。只要是翻译都可在这个集合中找到它的位置，比如宗教经典的翻译大多在集合的左端，可能是 T_1 或 T_2 或 T_3 。比如林纾的翻译一定是在集合的右端，可能是 T_{n-2} 或 T_{n-1} 或 T_n 。再比如本书中说的“全译”应该在靠向集合左端的部分，“变译”应该在靠向集合右端的部分。不管全译还是变译，都会由于译者的水平、经验与态度的差别，而决定了译文所在集合位置的不同。

最后是翻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何谓研究对象（object of study）？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就是其研究者观察、思考、研究的客体。客体是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认识与实践的对象。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其研究对象离不开由人组成的人类社会，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 with 主观性。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自己的客体，也就是各类物质与精神的产品，人的目的、愿望、思想、本质力量都凝结在这些产品中，从而在客体中证实了人的存在和力量。可见这样的对象化或客体化，也无法离开人的主观性。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我们曾认为是翻译的过程、结果与译文读者的反映，而且强调这个过程是译者的特殊思维活动过程，因为它不同于原文作者和译文作者的写作过程。^① 后来在许渊冲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

① 杨自俭：《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中国翻译》1989年第4期。

步明确了翻译学研究对象包含 8 大要素,^① 之后在青岛会议的主题报告中我们又一次论述了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阐释了 8 大要素之间的关系和 5 个世界的划分, 补充了翻译史、译论史与方法论三项内容。^② 我们为什么要反复讨论研究对象问题? 只因为它是学科独立的第一标志, 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 才能处理好它跟相关学科的关系, 才能进一步解决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比如词汇学), 学科就不可能真正独立, 其他学科就会来瓜分或占领它的研究领域。我们不会忘记 20 世纪 80 年代其他学科来占领译学研究领域的局面。语言学、文艺学、交际学、文化学、符号学, 还有比较文学、思维科学和传播学等都来申明翻译学是它的一部分, 好像翻译学附属哪个学科都有道理, 因为有部分内容跟那个学科相关。这种局面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结束了, 其他相关学科没有哪个再来瓜分或占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了, 因为所确定的译学研究对象包括翻译的全过程、翻译的结果、结果的影响, 这些内容为翻译学所独有, 别的学科无从瓜分或占领; 这些内容虽然跟所译的不同文体有不同的相关性, 但绝不会因文体的不同而改变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本质属性。随着翻译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大家对翻译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就越来越清楚了。

翻译学方法论研究是整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 加强这个系统的四个子系统的研究会全面推动学科的发展, 盼望译界学人学子在这个领域的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杨自俭

① 杨自俭:《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学报》1999 年创刊号。

② 杨自俭:《译学新探》,青岛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11 页。

目 录

导言	(1)
一、方法	(1)
二、方法论	(1)
三、翻译方法论	(2)
 第一章 翻译求似律	(5)
第一节 似与求似律	(5)
一、翻译相似律	(5)
二、翻译求似律	(6)
第二节 全译求极似	(8)
一、近似与胜似	(8)
二、意似、形似、风格似	(10)
第三节 变译求特效	(12)
一、“三特”求特效	(12)
二、多快好省，有的放矢	(14)
 第二章 全译方法论	(17)
第一节 全译的轴心：转换	(17)
一、转移意义	(17)
二、更换形式	(19)
第二节 转换的精髓：化	(20)
一、化的内涵	(20)
二、化的形式	(24)
第三节 全译的策略：直译 + 意译	(37)
一、直译	(37)
二、意译	(38)

第四节 七大全译方法	(41)
一、对译	(41)
二、增译	(42)
三、减译	(50)
四、转译	(56)
五、换译	(67)
六、分译	(82)
七、合译	(89)
 第三章 变译方法论	(94)
第一节 变译的轴心：摄取	(94)
一、吸取内容	(94)
二、改造形式	(95)
第二节 摄取的精髓：变	(96)
一、变的内涵	(96)
二、变的形式	(97)
第三节 变译的策略：变通 +（全译）	(98)
一、变通	(98)
二、全译	(104)
第四节 十二种变译方法	(104)
一、摘译	(104)
二、编译	(115)
三、译述	(142)
四、缩译	(147)
五、综述	(154)
六、述评	(163)
七、译评	(170)
八、译写	(181)
九、改译	(190)
十、阐释	(198)
十一、参译	(205)
十二、仿作	(211)

第四章 研究方法论	(218)
第一节 “三个充分”的研究要求	(218)
一、观察充分	(218)
二、描写充分	(224)
三、解释充分	(230)
第二节 “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	(232)
一、“表里值”小三角研究	(233)
二、“语思文”大三角研究	(238)
三、两个三角灵活研究	(243)
第三节 从方法到学科的研究阶梯	(253)
一、方法探索	(253)
二、历史总结	(254)
三、理论创立	(256)
四、学科建设	(264)
 参考与用例文献	(266)
 后记	(276)
 补记	(277)

导 言

一、方法

方法，汉语有多种说法，如“方”、“法”、“道”、“术”、“谋略”等。说某人入某行入了道，是说他方法上圆熟了。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在于方法的研究总结。方法比结论更重要，结论正确的前提是研究方法正确，两者是千里与毫厘的关系。

什么是方法呢？方法必含四要素：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使得自身获得发展与进步的手段（刘蔚华，1989：20）。说得通俗些，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门径、程序、手段等，具有获取、检验、运用、发展理论的职能。方法具有五性：

第一，目的性。方法服从服务于某个目的，包括目标、任务、要求、需要、意向等。

第二，规律性。方法是合乎规律的手段，是对事物规律的揭示。方法合乎规律，才能促进事物发展，使人类活动规范化、程式化、逻辑化。

第三，工具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为解决问题而设，科学方法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通往成功的桥梁。

第四，对象性。一定的方法作用于一定的对象，反之，对象制约着方法的萌发、设计与推广。从对象出发、从实际出发，是产生和完善方法的关键。

第五，实践性。方法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前者反映方法产生的根源，后者反映方法的推演和前瞻功能，方法可高居理论云端，也可远离实践一线，但不能不指向实践，缺乏实践根底最终不能指导实践的方法是无效的。

二、方法论

方法论是最有用的学问。贯穿于理论与实践的正是方法论，实践提升为

理论, 必经方法论的抽象, 理论躬亲于实践, 必以方法论为先导。

方法有层次, 分侧面, 各种方法可以构成方法论体系。从层次上讲, 有特殊或具体的方法, 有普遍或抽象的方法, 后者是前者的概括与总结, 前者一步步抽象, 又可以形成后者; 从侧面上讲, 有适应甲领域的方法, 也有适应乙领域的方法, 多侧面并列, 共构方法论体系。

按哲学的理解, 方法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理论, 包括哲学方法论、一般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说浅一点, 方法论即关于方法的理论与学说, 是一种概括性的知识, 从普遍意义上研究方法, 其最底层是具体而细致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论, 既研究从各种具体方法归纳出一般方法的过程, 又研究从一般方法演绎出各种具体方法的过程。

方法论决定研究者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方式、提炼出什么观点或提出什么假设, 在什么条件下作出什么结论。

三、翻译方法论

翻译方法论, 是翻译及其研究方式方法的总和。国内外翻译方法研究似乎很多, 只要用系统论去验察, 会发现大都不成体系或不完整。对翻译方法科学系统的认识, 就是翻译方法论。

翻译方法在翻译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它来自翻译实践又可指导翻译实践, 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翻译总的设想; 二是解决翻译问题的具体方法(方梦之, 2004c: 100)。

研究翻译方法论之前, 有必要研究翻译观。翻译观是对翻译的认识和态度。翻译观涉及翻译“怎么样”, 阐释“翻译是怎样的”, 即研究翻译的本质; 翻译方法论研究“怎么办”, 阐释“怎样开展和研究翻译活动”。翻译方法论与翻译观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翻译观决定翻译方法论, 决定翻译方法的选择。只有正确认识了什么是翻译, 才能在其指导下正确地认识翻译现象, 针对翻译活动采用恰当的翻译方法, 此时此刻, 方法才有可能上升为方法论。在翻译观与翻译方法论的互促互动过程中, 因主客观因素, 常常发生偏离和失误, 比如对严复的达旨术的误解就达百年之久。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变译大师严复的翻译现象, 有人不敢对原作大幅度地变通, 有人不敢教给学生摘译、编译等大量变通原作的变译方法, 据文军(2005: 60)调查, 甚至有个别老师否认变译属于翻译范畴, 这是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不足所致。

翻译本质的厘定应概括而不空泛, 具体而不烦琐, 专业而不深奥, 易懂而不俗套。试定如下:

翻译, 指人或机器将甲语文化信息变化为乙语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

维活动和语际活动。

以译作与原作的相似程度为准,可将翻译分为一对新范畴:全译与变译。

全译,指人或机器将甲语文化信息转化为乙语以求风格极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

变译,指人或机器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

翻译是追求译作与原作相似的活动,包括全译和变译,全译观是转换观,变译观是摄取观,相应的方法是全译方法(直译+意译)和变译方法(变通+〈全译〉)。

面对原作,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潜意识地,译者都会考虑译法的问题。是全译,还是变译,是采用全译下的对、增、减、转、换、分、合七种策略之一,或综合用之,还是采用变译之下的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八种策略之一,或综合用之,都是具体语境下的抉择。这一抉择涉及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研究翻译,不外乎研究翻译的主体、行为、过程、客体、结果、背景、影响等,既涉及翻译方法的选择,也涉及翻译研究视角的选择;既涉及微观和宏观研究,也涉及实践和历史研究,还涉及理论和学科研究。(杨自俭,2002)综合英汉语有关方法的界定,将其定义为:“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并由此认为它包括“认识方法、表达方法和实践方法”,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一个分层次的有机系统”。可见,翻译方法论包括翻译实践方法论和翻译研究方法论两大领域(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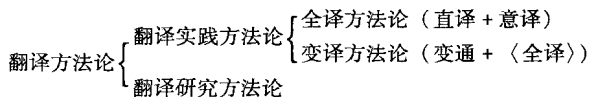


图1 翻译方法论体系

全译方法论的核心是信息转换,转的是内容,换的是形式,转换的策略是直译+意译,其精髓是求“化”,以化求得译文与原文最大限度的“似”。求似的全译方法有七类:对译、增译、减译、转译、换译、分译、合译,还可向下位细分。变译方法论的核心是信息摄取,抽汲的是内容,改造的是形式,摄取的策略是变通+(全译),其精髓是求“变”,以变求得译文满足读者的最大需求。求变的变通手段有八种:增、减、编、述、缩、并、改、

仿，由之演绎出十二种变译方法：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写、改译、阐释、参译、仿作。

翻译研究方法论指“三个充分”的研究要求、“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和从方法到学科的研究阶梯。“三个充分”包括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分别对应于翻译现象研究、翻译规律研究和翻译原理研究；两个三角的“小三角”为表—里—值，即语表形式—语里意义—语用价值，这是微观研究视角；两个三角的“大三角”为语—思—文，即语言比较—思维转换—文化交流，这是宏观研究视角。根据需要和可能，任何学者可从点（任意1角）、线（任意2角）、面（任意3—4角）、体（任意4—6角）对翻译进行研究。

“据我看，‘怎样译’的问题远远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因而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值得研究的问题。近几年关于翻译质量下降的抱怨之声时有所闻，‘怎样译’的问题现在是不是更值得翻译理论家关注，并切实努力帮助解决呢？”（罗进德，2007）翻译方法得以总结，翻译研究也就开始了。翻译方法和翻译史丰富、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产生系统化的理论，或者从理论出发，演绎构建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进一步系统化，可以形成一门学科。方法→历史→理论→学科，是翻译方法逐步从实践上升为学科的一般研究历程。